國家發展研究　第十卷第一期
2010 年 12 月　頁 159-188

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

黃玫瑄*

收稿日期：2010 年 6 月 18 日　　接受日期：2010 年 10 月 19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任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　要

華僑遍佈世界各國，在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孫中山對華僑有極高評價，尤其是南洋（東南亞）華僑，長期支持孫中山革命，進而使得中國革命成功。

南洋華僑多來自中國的廣東、福建，其中有不少客家華僑參加中國革命運動，本文採歷史研究途徑與政治學研究途徑，旨在探討南洋檳榔嶼與「三二九廣州之役」的關係，及其在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之重要性，並深入解析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的客家華僑之關係。

孫中山在檳榔嶼設革命指揮中心並召開「庇能會議」，與南洋華僑革命志士有相當密切之關係，而「客家因素」可視爲檳榔嶼之所以成爲「中國革命策源地」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關鍵詞：中國革命、孫中山、客家、南洋檳榔嶼（庇能）、三二九廣州之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孫中山（即孫文）爲著名的中國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中華民國的創立者，在中國近代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及政治制度史中，皆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清朝末年，他發動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尊稱他爲「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稱他爲「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現今的華人社會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且頗受各方懷念而有許多紀念性質之建物（紀念館、紀念堂、紀念公園、學校、道路）和活動。他也是全亞洲、全世界極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

孫中山與南洋（東南亞）[1]華僑革命志士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在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中，亦有許多客家革命志士參與（包括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此一歷史事實在近二十年來的「客家學」新研究領域中，頗受客家界及學術界的重視，因而有關孫中山與客家之相關議題，在客家學研究中已成爲眾所矚目之重要議題。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關於孫中山研究，極少論及孫中山與客家之關係；學術界、政治界在討論客家與近代中國政治時，也較多論及客家與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關係，較少探討客家與中國辛亥革命運動之關係。再者，近二十年來興起的客家學新研究領域，雖然有不少人談及孫中山與客家之關係，或探討東南亞客家華僑，但是仍少觸及孫中山與東南亞客家華僑之關係。因此，本文擬對孫中山與東南亞客家華僑作一探討，並以現今馬來西亞的檳城[2]爲探討中心，以「庇能

1 東南亞也就是清末以來中國人所稱的「南洋（Nanyang）」。（李恩涵，2003：1）

2 檳城位於馬來半島西半端的位置，亦稱檳榔嶼、檳州、庇能（馬來語：Pulau Pin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議」與「三二九廣州之役」爲例，說明孫中山與南洋客家華僑之關係。類似此種有關孫中山在中國辛亥革命運動中與客家之關係的討論研究，似較爲罕見而顯得特別。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一爲探討檳榔嶼與「三二九廣州之役」的關係，及其在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之重要性；二爲解析檳榔嶼的南洋客家華僑中的客家政治菁英，與孫中山所發動的「三二九廣州之役」之關係。研究問題爲：以「檳榔嶼」爲據點的南洋華僑，與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有何關係？南洋華僑在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中又有何重要性？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之關係爲何？謝逸橋、謝良牧兄弟爲什麼能在孫中山與南洋華僑之間扮演重要而關鍵性之角色？

本文採歷史研究途徑與政治學研究途徑，深入解析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之關係。本文將先簡論孫中山與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再探討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設革命指揮中心並召開「庇能會議」，決議發動「三二九廣州之役」，對中國革命運動產生影響，進而解析孫中山與南洋客家華僑之關係。

貳、孫中山與近代中國革命運動

19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的近代中國政治運動，先後有自強運動、變法運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等，其中辛亥革命運動之性質，是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較著名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

意爲檳榔之島、英語：Penang），是馬來西亞十三個聯邦州之一，也是馬來西亞的第二大城市。檳城州包括檳城島和威省（Province Vellesley，現在稱爲 Seberang-Prai）。參閱陳允中（1997：III-16、17）；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7%9F%E5%9F%8E。2010 / 9 / 2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邱榮舉、謝欣如，2009：1、5-6）

孫中山在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中，曾結合了「華僑」、「學界」、「會黨」、「基督教會」、「農工商」、「新軍」等多方力量來共同參與，且發動十一次革命起義的軍事行動，此種狀況在海外華僑參與中國革命運動中相當明顯而獨特，頗值得吾人重視。

一、華僑參加會黨與協助中國革命運動

在中國，會黨是清代南方秘密社會的一系（另一系爲北方的白蓮教），初名洪門，一名天地會，又叫三點會，或稱三合會。天地會或訛爲添弟會，又改稱哥老會，其別派有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鉢子會、告化會、小紅旗會、小刀會、劍仔會等目。會中人自稱洪門或洪家，別稱洪幫，世訛爲紅幫。（張玉法，1993：223-224）清朝時期「天地會」先盛行於閩、粵、臺灣，後來擴及長江流域、南洋和其他國家。

華僑參加會黨者有不少人，南洋華僑中參與會黨者亦眾。孫中山在籌組中國革命黨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過程中，曾結合會黨組織，因而孫中山所籌組的「興中會」和「同盟會」，實與會黨組織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孫中山曾說：「慷慨助餉，多爲華僑；熱心宣傳，多爲學界；衝鋒破敵，則在軍隊與會黨。」[3]由此可知，「會黨」與孫中山所推動之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相當密切。

二、孫中山曾發動十一次革命起義

孫中山的一生，倡言革命，奔走革命，曾發動過十一次革命起義。

---

3 此段文句引自孫中山於民國 12 年（1923 年）1 月 29 日所撰寫的《中國革命史》，係收錄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的《國父全集》第二冊的孫中山論著，據考證原標題爲「中國之革命」。（孫中山，1923：186、1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中山所發動的十次失敗的軍事行動中，有兩次是在同盟會成立之前，首次是在 1895 年的廣州起義，不過關於該次的舉事，只訂計畫，並未付諸實行；第二次是 1900 年的惠州起義，由鄭士良策劃。至於其餘的八次，時間從 1907 至 1911 年，先後發生在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總計：廣西和雲南各一次，廣東六次。茲簡要列表如下。

表 1　孫中山在中國曾發動的十一次革命起義簡表

次數別	革命起義行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備　註
1	廣州之役	1895 年	廣東廣州	
2	惠州之役	1900 年	廣東惠州	
3	潮州黃岡之役	1907 年	廣東潮州	
4	惠州七女湖之役	1907 年	廣東惠州	
5	欽州防城之役	1907 年	廣西防城	
6	鎮南關之役	1907 年	廣西鎮南關	
7	欽廉之役	1908 年	廣東欽廉	
8	雲南河口之役	1908 年	雲南河口	
9	廣州新軍之役	1910 年	廣東廣州	
10	三二九廣州之役	1911 年	廣東廣州	即廣州三二九起義，亦有人稱之爲「黃花崗之役」[4]
11	武昌之役	1911 年	湖北武昌	即武昌起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上述孫中山所發動過的十一次革命起義軍事行動中，遍佈世界

[4] 該役爲革命犧牲的烈士，總數爲 86 人，世人多習稱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關於此役之名稱，可稱爲「廣州三二九起義」或「三二九廣州之役」（即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但不宜以「黃花崗之役」稱之。（張希哲，1997：203-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地的華僑出錢出力，支持和參與中國革命運動，其中南洋華僑，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曾扮演著極其重要而關鍵性之角色，例如：孫中山在同盟會後期，與許多南洋華僑共同在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召開「庇能會議」，策劃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該次革命雖然以失敗告終，卻對 1911 年的武昌起義產生重大影響，對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最後的成功，影響極爲深遠。

三、中國同盟會在南洋鼓吹中國革命

孫中山奔走世界各地宣揚革命，1905 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1906 年 4 月 6 日（陰曆 3 月 13 日）孫中山從法國返抵新加坡，由陳楚楠、張永福等迎接，住進「晚晴園」中，並在該處成立同盟會分會，作爲南洋英、荷兩屬各地之革命總機關。當日首先宣誓入盟者爲陳楚楠、張永福、李竹癡三人，翌日邀約林義順、鄧子瑜、李曉生、謝心準、許子麟等人入盟，繼而張人傑、尤列亦皆於此分會入盟，各埠「中和堂」（爲會黨性質）會員也陸續加入。新加坡分會舉陳楚楠爲會長，張永福副之，林義順任會計。三個月後，孫中山由日本再至新加坡，親率陳楚楠、李竹癡，林義順等到吉隆坡、檳榔嶼（庇能）等地成立分會。（劉世昌，1986：54-55）檳榔嶼同盟會成立之後，對以後策動籌款，在國內舉義的軍事行動，貢獻巨大，歷史上所謂「鎮南關之役」（1907 年），還有接著下來的「河口之役」（1908 年），以及著名的「三二九廣州之役」等，都和檳榔嶼同盟會結上無可磨滅的歷史淵源。（張少寬，2004：111）

根據薛君度在《黃興與中國革命》乙書之記載，1905 至 1908 年間，在南洋的幾個主要城市紛紛建立了同盟會分會：有西貢（1905）、新加坡（1906）、河內（1907）、仰光（1908）、曼谷（1908）等。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的革命活動，後來是由同盟會南洋支部指揮的，南洋支部於 1908 年秋開始在新加坡活動，1909 年春移至檳榔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愼之譯，薛君度著，1980：41）使得當時馬來亞檳榔嶼成爲「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機關」，檳榔嶼成爲中國革命的海外策源地，南洋華僑乃成爲當時參與協助孫中山等人從事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支柱。

四、從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相關概念來探討會黨與革命黨

(一) 從歷史學來探討會黨與中國近代革命運動

「會黨」即屬於「秘密會社」（secret society）的組織。據布萊斯（Blythe, W. L.）解釋「秘密會社」的定義爲：一個群體的存在可能是公開的，但其活動及其各層序的職位身份，卻不爲公眾人士所認知。（黃建淳，1988：5）（麥留芳，1985：11）

根據著名史學家張玉法的研究，在其所著《辛亥革命史論》乙書中，亦有關於會黨與辛亥革命的討論，張玉法認爲：辛亥革命的社會參與是廣闊的，有知識份子，有工商界人士，有軍人，有官僚，有改革派份子，有華僑，也有會黨。知識份子是辛亥革命的領導階層，商人和華僑主要的表現在捐款方面，官僚和改革派份子推波助瀾，軍人和會黨則爲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作爲革命武力，軍人的表現主要在武昌革命爆發及其以後，會黨則自始與革命運動相結合，但因爲會黨缺乏具有遠見的領袖，其羣眾又爲烏合，不爲正統社會所容，到民國建立，軍人因參與革命而獲政權，會黨則退回幕後，成爲其他政治和社會運動的羣眾。（張玉法，1993：223）

再者，張玉法在其所著《清季的立憲團體》乙書中認爲：清季的政治結社發生雖早，類似於政黨的組織，則遲至資政院開院以後才出現。此中原因，一方面是前此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不夠，另一方面則爲崛起的士紳階層，至是始易作全國性的結合。首先是資政院議員組織政團，當這些政團向院外發展勢力，並進而在各地建立支部時，即漸具有政黨的規模。（張玉法，1985：477-4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此可知，歷史學界對於會黨研究相當重視，且對於會黨在孫中山所推動的中國革命運動中之角色與重要性頗有研究。再者，歷史學界對中國政黨之最早出現，已確認是在清末的資政院。

(二) 從政治學來探討中國近代政治中的會黨、派系及政黨

政黨（political party）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現代政黨與古有政黨有所不同，學者咸稱古代的政黨爲派閥或派系或朋黨（factions or cliques），與含有現代意義或法定的政黨（parties）不同。（程全生，1984：13）

在中國歷史上，唐代有牛李黨，宋代有新舊黨，明代有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的黨爭出現，但學者均稱之「朋黨」（fliques）。到清末民初，始有現代政黨觀念的政治團體出現，這些政黨如何來的呢？按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理念解釋，當然是逐漸發展而來，傳統的會黨、朋黨及各黨政治團體就是成爲政黨的基礎。政治黨派是政治組織的一種型態，係在一個政治體系的活動達到某種複雜程度，而需要發展新的、更寬廣的政治形式時出現。中國政治體系發展到晚清，由於中西交流加速，使整個社會體系產生鉅變，西方政黨觀念隨之輸入，此時就需要有更新、更寬廣的政治制度才能適應新時代。將近一百年來，數百個政治團體的出現，它們代表著中國政黨的演進歷程。（陳福成，1988：357-358）

近代民主政治起源於英國，而具有現代意義政黨的形成，亦以英國爲濫觴。（谷光宇，1985：59）政黨政治是歐美發達的產物。「政黨政治」與「議會政治」爲什麼在中國不發達呢？中國自古帝王的官僚政治發達，君主可以依憑官僚制度去獲得所需的財政稅收，不需要像西歐那樣的「議會」來協助籌措財政稅收。中國因爲「議會政治」未成長，隨之「政黨政治」也發達不起來。換言之，歐美的「政黨政治」是「議會政治」的產物，中國沒有「議會」的傳統，也就沒有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式的「政黨」，歷史上只有追求私利的「朋黨」。（許介鱗，1989：5）

關於政黨的定義，呂亞力在《政治學》乙書中提到：早期討論政黨的人士界定政黨，常不免以一己的價值判斷爲準，譬如 18 世紀的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界定政黨：「按照其彼此同意的原則，協力增進國家利益而聯合的一群人」。（Burke, 1861: 530）又如麥迪森認爲朋黨是「一群因共同的利慾或感情而結集的公民，其利慾或感情不利於其他公民之權利，或妨害社會的長期或共同之利益」。呂亞力（1978：88）認爲這些都是規範性的定義，對於政治學的科學研究，是完全無助的。要真正了解政黨本身，我們還得發展「實證」的定義。

再者，蘭尼（Austin Ranney）與肯道爾（Willmoore Kendall）對「政黨」所下的定義爲：政黨是自主的有組織集團，它從事候選人的提名及競選，以期最後獲得並施行對政府的人事與政策之控制。（Ranney *and* Kendall, 1956: 85）潘諾克與史密斯認爲政黨係「社會中大小利益集團的聯盟」，強調當代民主國家政黨的另一主要特色——政黨是社會的仲裁者。呂亞力（1978：88-89）特別指出政黨有下列特徵：(1) 其爲一種社會集團；(2) 爲利益的積聚體；(3) 爲一層級組織。

由此可知，在政治學中派閥或派系或朋黨，與「政黨」不可混爲一談，彼此是不同的。

參、南洋華僑以檳榔嶼為據點對中國革命作出貢獻

孫中山不但選擇南洋作爲政治避難之地，同時也以南洋作爲推動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其中，在同盟會後期，孫中山又以馬來亞的檳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嶼作爲他籌集一切資源，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尤其他將「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由新加坡移設檳榔嶼，並積極進行革命準備。革命黨要員，如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汪精衛、居正、戴季陶等人，長期駐於檳榔嶼。[5] 因此，檳榔嶼被譽爲「中國革命策源地」。（張少寬，2004：115-116）

一、檳榔嶼「庇能會議」決議發動「三二九廣州之役」

所謂「庇能會議」（Penang Conference），又稱檳榔嶼會議或檳城會議，係指 1910 年 11 月 13 日（陰曆 10 月 12 日），孫中山在同盟會後期於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所召開之會議。「庇能」是檳城英文名 “Penang” 的譯音，「庇能會議」地點在柑仔園 400 號住所，由孫中山召集同盟會裡所有他的親信們，舉行關係中國革命運動關鍵而重要的會議。（張少寬，2004：序 X、19）孫中山經由該次所謂的「庇能會議」之召開，決心再籌募資金發動「廣州革命」（1911 年），乃促成「三二九廣州之役」，該次革命起義是孫中山的第十次革命起義，是 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奏，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實占有極重要而關鍵的地位。

過去，學術界、政治界談論孫中山與中國辛亥革命運動時，對於東南亞（南洋）華僑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與貢獻，不夠瞭解、著墨較少或較少重視。縱使論及東南亞華僑之重要性及其貢獻，亦較多論及當時的新加坡，而少論及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實有失偏頗而不符合史實，故本文在討論東南亞華僑與中國辛亥革命運動時，特別論及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及當時英屬殖民地南洋華僑之重要性，及其對中國革命成功之貢獻。

---

5 「檳城閱書報社」是孫中山赴檳城倡言革命後，由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秉承孫中山意旨而創辦，是檳城革命運動的活動中心。（張少寬，2004：11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南洋華僑爲中國革命運動作出貢獻

發動革命，不但要有人，也要有錢。孫中山在中國所發動的革命起義中，在人的方面，既需要有軍事領導人才如黃興等，也需要有許許多多的不怕死、肯爲國犧牲的革命志士；在錢的方面，既需要有平時在海內外鼓吹革命所需的龐大經費，也需要有發動革命起義所需的軍費，否則沒有充分的人員與武器彈藥，革命起義的軍事行動實難以成功。孫中山、黃興等人在 1905 年，將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和黃興所領導的「華興會」共同合組而成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就是要將所有反清的人才與經費集結在一起，以利中國革命運動早日成功。

吳智棠在〈論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黃花岡起義和華僑對是役的重大貢獻〉乙文中也提到：參加「三二九廣州之役」壯烈犧牲的華僑，迄今史家公認的有 29 人，據張希哲教授考證爲 31 人，他們原來分別僑居越南、緬甸、新加坡和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他們之中有工人、農民、職員、教師、記者、商人、傳教士等，其中又以祖籍廣東者佔大多數。說明華僑各階層幾乎都有參加這次起義的，但起義參戰的主力則是勞動人民。（吳智棠，1997：19）（張曉威，2005：276）

簡言之，在孫中山的起義軍事行動中，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不僅是「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機關」之所在地，且孫中山所籌募的六十萬兩銀子[6] 三分之一是在檳榔嶼籌獲；換言之，檳榔嶼一地，爲支持孫

6　各地所籌款項，請參閱鄒魯（1953：10、13-14）；張曉威（2005：276）。
銀元是中國在清末民初採用的銀本位貨幣單位。
叻幣（Straits Dollar），是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汶萊在英殖民地時期，由英殖民政府所發行的貨幣。發行單位是海峽殖民地政府，使用年限爲 1826～1939 年。1939 年，英殖民政府發行新貨幣馬來亞元（Malayan Dollar）來取代叻幣。馬來亞元發行單位是馬來亞金融管理局（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Malay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當年曾先後共捐助二十萬兩銀子，這數目還不包括中華民國成立後光復各省的匯款，以及北伐的軍債等等。[7]由此可知，檳榔嶼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當年南洋華僑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確實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

肆、與孫中山革命有關的南洋客家華僑

華僑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國、日本、南洋（東南亞）、歐洲等地，過去曾有不少華僑參與協助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由於華僑曾協助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且作出巨大貢獻，因而孫中山對華僑亦極爲肯定且有極高之評價，故有所謂「華僑爲革命之母」的論點。[8]

與孫中山革命有關的南洋華僑，爲數眾多，因而常採分幫方式處理，例如：新加坡、福、潮、客、廣，各爲一幫，瓊附入潮，肇附入廣。（蔣有川，1974：112）因而對南洋華僑之探討，可找南洋華僑中的「菁英」來多加瞭解，以探究南洋華僑。同理，吾人若欲多瞭解與孫中山革命相關的南洋客家華僑，其中檳榔嶼的客家政治菁英頗值得重視與參考。

「菁英」一辭之出現，與系統化理論之提出，都要歸諸 19 世紀

參閱：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B%E5%B8%81。2010/9/23 檢索。

經濟百科 http://wiki.hroot.com/wiki/%E5%8F%BB%E5 %B8%81。2010/9/23 檢索。

7 參閱張少寬（2004：59）；吳清基（2002）。

8 劉阿榮在〈南洋華僑在孫中山革命中的角色〉乙文中指出：孫中山革命嘗言：立黨、宣傳、起義，他在南洋所做的工作也可概括爲「籌設革命支部」（立黨）、辦報及演講以宣傳革命主義（宣傳）、海外華僑雖然無法在當地起義，卻有提供資金協助革命事業之推展，因此，孫中山稱「華僑爲革命之母」，良有以也。（劉阿榮，2010：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末葉與 20 世紀初葉的一些學者，包括：從古典菁英主義（Classical Elitism）的莫斯卡（Gaetano Mosca）、伯雷圖（Vilfredo Pareto）、米歇爾（Roberto Michels）；民主菁英主義（Democratic Elitism)的韋伯（Max Weber）、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到現代菁英論（Modern Elitist Perspectives）。（呂亞力，2008：86）（謝欣如，2009：17）相關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爲「規範性研究」與「實證研究」兩類。「規範性研究」主要是以政治權力是否爲政治菁英所壟斷，政治菁英階層的分析，及如何成爲政治菁英等問題之詮釋爲主。至於「實證研究」，則是在 1950 年代，拉斯威爾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組織研究小組，從事一系列研究，將政治菁英的研究從規範理論的探討帶到實證研究範疇。（彭懷恩，1986：10）（謝欣如，2009：17-19）

臺灣學者則有胡佛、呂亞力、江炳倫、陳鴻瑜、趙永茂、陳陽德、彭懷恩、陳明通、謝欣如等，有關於「政治菁英」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頗能提供吾人有關政治菁英研究之參考。

關於「客家政治菁英」，根據謝欣如（2009：60）在其博士論文《客家政治菁英與臺灣憲政發展（1945-2008）》的論點：凡「具有客家血統」或「認同客家」者，在政治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或控制權的少數政治人物，皆可謂「客家政治菁英」。本文擬以當時在南洋檳榔嶼華僑中的「客家政治菁英」爲例，說明與孫中山革命有關的南洋客家華僑，茲分四個重點解析：(1) 檳榔嶼最早期副領事皆爲東南亞客家華僑；(2) 孫中山與客家革命志士謝逸橋、謝良牧昆仲關係密切；(3) 長期護衛孫中山的客家革命志士姚雨平；(4) 執行暗殺的客家革命志士溫生才、陳敬岳等。

一、檳榔嶼最早期副領事皆爲東南亞客家華僑

東南亞的客家華僑，多源自中國廣東省（粵）、福建省（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特別是粵東、閩西的客家地區，有不少是在明、清時期，因避自然災害或戰亂，或因外出做傭工、經商等經濟因素而移居至南洋。因此，閩粵籍的南洋華僑與孫中山等革命志士，具有較親的血緣與地緣關係，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清朝政府早期委派的南洋領事，也以閩、粵籍爲多。（黃賢強，2002：213）

大清帝國在南洋設領事館，改採保護僑民政策，及在檳榔嶼設領事館，實與黃遵憲有密切的關係。黃遵憲曾上書報告華僑疾苦，並請轉奏保護僑民政策。（宋哲美，1966：76）當時新加坡的總領事黃遵憲爲廣東嘉應州梅縣客家人，到新加坡任職後，基於多方因素之綜合考量，找客家華僑擔任副領事。因而在檳榔嶼最早期所設置的五位副領事，[9] 皆由屬客家幫的客家華僑擔任，他們是張弼士、張煜南（即張榕軒）、謝榮光（即謝夢池，是謝逸橋、謝良牧兄弟之伯父）、梁碧如（是謝榮光的女婿）、戴春榮，且他們皆是廣東省嘉應州（今梅州市）的客家華僑，請參閱表 2。

當時在檳榔嶼的華僑，屬於客家方言群的華僑約有 10% 左右，而屬於廣府方言群、閩南方言群、潮州方言群的華僑則各約有 20% 多，其他爲土生方言群、福州方言群及海南方言群，參閱表 3：各方言群在檳榔嶼華人人口中的百分比（以 1881 年、1891 年和 1901 年之人口統計分析）。

9 清廷派駐檳榔嶼之副領事爲當地最高的領事官，當時習慣被稱爲領事，隸屬於新加坡總領事之下，是北馬地區最高的領事官。（黃賢強，2003：288-2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晚清駐檳榔嶼歷任副領事的任期與正式職銜（1893～1911）

順序	姓　名	籍　貫	職　銜	任　職　時　間
1	張弼士	廣東大埔	副領事	1893 年 5 月至 1894 年 9 月
2	張煜南	廣東梅縣	代理副領事	1894 年 9 月至 1895 年 6 月
3	謝榮光	廣東梅縣	代理副領事	1895 年 6 月至 1903 年 1 月
4	梁碧如	廣東梅縣	代理副領事 副領事	1903 年 1 月至 1905 年 1 月 1905 年 1 月至 1907 年 6 月
5	謝榮光	廣東梅縣	代理副領事	1907 年 7 月至 1907 年 12 月
6	戴春榮	廣東大埔	代理副領事 副領事 領事	1907 年 12 月至 1908 年 4 月 1908 年 4 月至 1911 年 5 月 31 日 1911 年 6 月 1 日至 1911 年底

資料來源：張曉威（2005：113）。

表 3　各方言群在檳榔嶼華人人口中的百分比（1881、1891 & 1901）

方言群 / 年份	閩南	海南	廣府	客家	潮州	土生	福州	不詳
1881 年	24%	4%	18%	10%	28%	15%		1%
1891 年	28%	3%	20%	8%	22%	19%		
1901 年	29%	3%	19%	8%	16%	24%	1%	

資料來源：*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81*, p.2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91*, pp.96-97;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901*, pp.70-71，轉引自張曉威，2005：91。

檳榔嶼的領事館最初只設副領事一人，後來才提升爲設領事。南洋檳榔嶼從一開始設置領事館，約有半個世紀皆由客家幫主控，在檳榔嶼複雜的「幫權政治」[10] 中舉足輕重，此對當地幫權政治的運作

[10] 關於檳榔嶼華人社會「幫權政治」的討論，張曉威（2005：203-212）將其分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孫中山與客家革命志士謝逸橋、謝良牧昆仲關係密切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有不少南洋客家革命志士投入中國革命運動。孫中山與南洋華僑有密切關係，實與孫中山之革命伙伴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在檳榔嶼有「客家因素」[11] 等特別關係有關。

謝逸橋、謝良牧兄弟爲廣東嘉應州梅縣客家人，亦爲東南亞客家華僑。謝家在廣東嘉應州松口鎮是客家望族，謝逸橋（原名錫元，1874-1926）與謝良牧（原名鈞元，1884-1931）是同胞兄弟，皆出生於屬純客家庄的松口鎮銅琶村，其祖父叫謝益卿，是當時嶺東地區有名的客家華僑富商，且樂善好施，曾大力支助丘逢甲、溫仲和、何士果等人創辦嶺東同文學堂，以培養新學人才，而謝逸橋後來成爲該校的傑出校友。祖父謝益卿和伯父謝夢池（即謝榮光）均係英屬檳榔嶼的僑領。其父謝國生居於家鄉，熱心公益，喜愛詩文，生有八子，謝逸橋是長子，謝良牧是三子。（黃玉釗，1989：150）

三部分來論述：(1) 客家幫內部的權力重組；(2)「幫聯」內部運作的調整；(3) 華人社會幫權政治的跨幫幫際關係的新發展。

11 此處所謂「客家因素」，是指兩個方面：

一爲孫中山與謝逸橋、謝良牧兄弟的客家因緣（直接的客家因素）：謝逸橋、謝良牧兄弟爲廣東嘉應州梅縣客家人，與孫中山關係極爲密切，爲革命伙伴，常在中國客家地區宣揚革命理念、組織會黨、號召客家革命志士，並透過客家管道充分運用謝氏家族與東南亞華僑之良好關係，爲「三二九廣州之役」（1911）籌募革命經費，直接爲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做出貢獻。

二爲孫中山與最早期檳榔嶼的客家幫（間接的客家因素）：黃遵憲與檳榔嶼最早期之五位副領事：張弼士、張煜南（即張榕軒）、謝榮光（即謝夢池）、梁碧如、戴春榮，皆爲以檳榔嶼爲據點的東南亞客家華僑，且都是中國廣東省嘉應州的客家人，亦爲在檳榔嶼以張弼士爲首的「埔梅集團」之客家幫的重要成員，間接幫助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逸橋是旅居馬來西亞的客家華僑知識分子。留學日本之前，曾在家鄉秘密加入民間反清復明組織——洪門會，被拜爲大哥（即頭領）。（賴紹祥、房學嘉，1992：1）謝逸橋曾於 1900 年，聞孫中山在香港策劃革命，專程赴香港求見，聲言要跟隨孫中山「澄清天下」。謝逸橋返鄉後組織松口團防局，聯絡粵閩贛邊各路會堂，與當時在湖北策劃武裝勤王的自立軍通聲氣。是役失敗後，謝逸橋爲躲避清政府的緝捕，初赴南洋，後輾轉日本，在東京結識了黃興等革命派人士，經常討論時政。而在謝逸橋的影響下，先後赴日本的客家青年有謝良牧、謝輝元、謝適群、溫靖侯、溫奮立、熊越珊、林修明、黃慕松、鍾動、曾旺節、梁鳴九等。[12]（賴紹祥、房學嘉，1992：1-2）

謝氏兄弟於 1905 年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謝良牧任同盟會會計部長，曾到南洋各地籌設同盟會分部，並曾被委任爲新加坡支部主持人。謝良牧曾與其兄謝逸橋跟隨孫中山，從日本橫濱到越南西貢，與法國駐安南外交官商議在西貢組織同盟會的問題。

1907 年 3 月，孫中山在安南（越南）河內建立領導革命起義的總機關，委請許雪秋負責廣東省潮州、嘉應州一帶的革命起義工作。謝良牧在香港與許雪秋商議，後來謝良牧返回廣東省嘉應州梅縣策動；謝逸橋則利用其祖父謝益卿、伯父謝夢池（即謝榮光）在潮汕鐵路公司擁有巨股，以及當時謝逸橋在鐵路局供職機會，通過鐵路渠道秘密運送軍火和傳遞信息。1907 年 5 月，潮州黃岡起義失敗後，謝逸橋、謝良牧與溫靖侯等同盟會員，返回梅縣，在松口鎮籌辦體育學堂，以培訓革命軍事幹部爲名，爲革命起義造就了不少軍事人才。居鄉不久，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先後返回馬來半島檳榔嶼。

[12] 根據賴紹祥與房學嘉編著之《客籍志士與辛亥革命》乙書所載，經由梅州文史工作者的田野調查，當年中國客家留日青年參與孫中山的同盟會，確實有不少人是受謝逸橋、謝良牧兄弟之影響而加入中國革命運動行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10 年孫中山到檳榔嶼，召集同盟會會員開會，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參與接待工作。不久，廣州新軍起義失敗，黃興、趙聲等人從香港來檳榔嶼，準備取道緬甸進入雲南，再次起義。謝逸橋、謝良牧兄弟認爲雲南地處邊陲，不足舉大事，力阻其行。黃興等人不聽勸阻，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只得向孫中山報告，孫中山贊同謝氏兄弟之見解，乃命黃興、趙聲改圖廣州。孫中山還爲此特別召開會議商討，最後決定再次發動大規模的廣州起義，並在香港設立統籌部。孫中山到歐美各國華僑中籌募軍餉，謝逸橋在英屬七洲府合籌軍餉共 4.7 萬銀元;謝良牧也在荷屬各埠籌得 3 萬多銀元。加上孫中山在歐美所籌，共籌集了革命經費近 20 萬銀元。同時謝氏兄弟還解囊資助嘉應地區前往廣州起義人士的旅費。同年 10 月，武昌起義成功，爲了團結一切力量，支持革命，謝良牧力主策動廣東水師提督李准起義。李准通過與香港革命黨人聯繫，表示願依所列條件執行，因而加速了廣東的光復過程。與此同時，謝逸橋跟許雪秋率民軍響應並支持張醁村發動的潮汕起義，爲光復潮汕作出了貢獻。

中華民國成立後，謝良牧當選爲參議院議員，繼續跟隨孫中山進行革命，積極參與討袁護法運動。他奉孫中山之命奔走於河北、山西等地，與海軍總長程璧光共謀護法，率艦隊南下，設元帥府於廣州。1918 年春，當援閩粵軍回師後，孫中山由廣州來到汕頭檢閱軍隊，並在廣東省嘉應州大埔縣三河壩視察，從三河乘輪上溯到嘉應州梅縣松口鎮探望謝氏兄弟，在謝家住了三天，駐足於「愛春樓」，並親書門樓兩聯以贈，至今珍藏其家。（黃玉釗，1989：150-152）

三、長期護衛孫中山的客家革命志士姚雨平

姚雨平（1882～1974），原名士雲，字宇龍，號立人，廣東嘉應州平遠縣大柘鄉人，清末秀才，也是東南亞客家華僑。1907 年姚雨平經由謝良牧、張谷山介紹加入同盟會。旋參與策劃潮州黃岡之役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7），是役失敗後，返鄉在梅縣松口鎮參與創辦「松口體育傳習所」，以培養軍事人才。後來他又先後參與雲南河口之役（1908）、廣州新軍之役（1910）後，赴南洋募集軍餉，1910 年孫中山等人在南洋檳榔嶼召開會議，決定在廣州再度起義，並在香港設立統籌部，由黃興擔任部長、趙聲副之，下設秘書、出納、儲備、調度、編制、調查、總務八課，姚雨平任調度課課長，掌管運動新舊軍及調集人員之事。當時統籌部原定以四路敢死隊分頭出擊，由黃興、姚雨平、胡毅生、陳炯明各率一隊。姚雨平因儲備課誤了事，他手無寸鐵，被迫撤離，其餘胡毅生、陳炯明所率隊伍，都沒有行動，只有黃興所率敢死隊在孤軍作戰，終告失敗。姚雨平後追隨孫中山組織粵軍北伐，屢建戰功，且長期護衛孫中山。（賴紹祥、房學嘉，1992：131-135）

四、執行暗殺的客家革命志士溫生才、陳敬岳等

(一) 暗殺清廷鎮粵將軍孚琦的客家革命志士溫生才

溫生才（字練生，1870-1911），廣東嘉應州梅縣丙村井塘村人，是南洋客家華僑，是辛亥革命紅花崗[13] 四烈士之一。1903 年，溫生才往南洋謀生，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做工。1907 年加入同盟會。1911 年，由廣東同鄉會籌款給他回中國。抵廣州後，與華僑興業社及革命黨人聯繫，執行暗殺清廷鎮粵將軍孚琦的任務，雖擊斃孚琦，但自己卻被俘就義。（黃玉釗，1989：92）

[13] 辛亥革命烈士所埋葬之處習稱爲「黃花崗」。紅花崗本爲一淨土，後捐出以埋葬三二九廣州之役諸烈士的骨骸。潘達微以「紅花」二字不若「黃花」優美，而改「紅花」名爲「黃花」。日後黃花崗之名遂被沿用之。（鄒魯，1953：72-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 炸傷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的客家革命志士陳敬岳

陳敬岳（字接祥，1867～1911），廣東嘉應州梅縣丙村橫石人，是南洋客家華僑，是辛亥革命紅花崗四烈士之一。1903 年冬往馬來亞，在吉隆坡任教於一間華人學校，加入「中和堂」，後再加入同盟會，積極從事革命。1911 年「三二九廣州之役」前夕，陳敬岳與王和順、溫德政等同盟會員，率華僑 30 餘人回中國參加黃興領導的「三二九廣州之役」。是役，黃興和陳敬岳、王和順等人分率先峰隊圍攻廣東督署，因力量懸殊而失敗。後來他又和林冠慈共謀行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雖炸傷李准，但兩人先後犧牲。（黃玉釗，1989：90）

伍、結論

關於孫中山與東南亞客家華僑之關係，若以南洋檳榔嶼（即現今馬來西亞檳城）爲探討中心，本文的研究結論有五：

一、南洋華僑所參加的「會黨」曾協助中國的「革命黨」，並逐漸朝向「政黨」發展，以利追求中國民主

孫中山爲推動中國革命，曾先後組織「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其中，在孫中山有生之年，有關他所創建的「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的性質，孫中山認爲皆屬於革命黨的性質，在這幾個時期所推動的政治爲「革命政治」，不是「政黨政治」；至於民國初年的「國民黨」，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是孫中山則認爲其性質是屬於普通的政黨，與革命黨的性質有所不同，它較類似於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此時期所推動的政治爲「政黨政治」，不是「革命政治」。（邱榮舉、謝欣如，2009：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者，著名的政治學者杜維傑（Maurice Duverger）曾將政黨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從選舉與國會中所產生，即所謂「內造政黨」（internal party）；一類是在國會以外所產生，即所謂「外造政黨」（external party）。（Duverger, 1963: XXXI-XXXVII）內造政黨是建築在人民的選舉之上，由當選的國會議員所組織及演變而成；外造政黨則由少數發動某種運動的政治人物爲中心，逐漸擴大發展而成。因之，內造政黨，根基在下，著重人民的選舉；而外造政黨，威權在上，強調專權的領導。杜維傑的這種分類，胡佛認爲可以用到政黨的變遷與發展上，即將外造政黨與內造政黨放在一線的兩端，如一個政黨，由外造政黨的一端，逐步走向內造政黨的一端，就表示人民能逐漸選擇，使趨向於現代化。（胡佛，1975：15）

吾人若以政治學中「政黨」理論（例如：杜維傑的政黨理論），來檢視孫中山所創建的「政黨」——中國國民黨，似可得出一個推論：由革命黨漸朝向民主政黨發展，且它是由「外造政黨」逐步走向「內造政黨」發展。本文借用「政黨研究」來探討南洋華僑參與會黨與革命黨，以利探究南洋華僑與中國政治之關係。

二、檳榔嶼是二十世紀初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之策源地

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期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之革命大本營，是由日本東京本部開始，然後移至安南（越南）河內，再移至新加坡，最後又移至當時馬來亞的檳榔嶼。檳榔嶼是當年同盟會南洋支部所在地，是孫中山在同盟會後期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之革命大本營。1910 年在檳榔嶼召開「庇能會議」，決議發動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此爲辛亥武昌起義之先聲，對中國革命最後的成功影響深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南洋華僑對孫中山推動中國革命運動曾作出巨大貢獻

南洋華僑主要是來自中國的廣東、福建。由於政治、經濟等因素，早期就有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廣東、福建人民移居至南洋發展；在 1840 年代以後，中國海禁政策改變，荷、西、法等國家在南洋殖民統治，也需要大量華工前往開發，故南洋華僑人數大增，且對當地作出重大貢獻。所謂「三二九廣州之役」，其所需要的軍事費用，是在「庇能會議」中決議籌集的，且是經由南洋檳榔嶼華僑熱心捐助籌集才達成者，故「三二九廣州之役」是南洋華僑促成的重要戰役，在中國革命史上極爲重要而關鍵。孫中山歷經十次失敗的革命起義，第十一次辛亥武昌起義才成功，主要是獲得南洋華僑在財力、人力上的支持，此亦兼含南洋客家政治菁英對革命之貢獻與影響。

四、社會科學中的「菁英研究」，頗適合應用於有關孫中山與南洋華僑之關係的相關研究

呂亞力教授認爲：菁英分析的發展，首先應歸功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三位歐陸政治社會學者——莫斯卡（Gaetano Mosca）、柏雷圖（Vilfredo Pareto）與密契爾斯（Roberto Michels）。這三位學者的理論性探討奠定了「菁英研究」的基石。一言以蔽之：一切政治系統，不論其形式爲何，都可分爲兩個階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實際行使權力者）叫做政治菁英（political elite），而此菁英爲政治系統最重要的一面，研究政治的學者，必須以其爲注意的中心。政治菁英是社會中唯一掌握政治權力（或具有大部分政治權力）並作重要政治決策的集團。菁英份子乃是政治事務中最活躍的份子。我們專注於此類人士的分析就最能洞悉政治生活的過程與內涵。（呂亞力，1979：2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南洋客家華僑在檳榔嶼的客家政治菁英曾扮演重要政治角色

當時檳榔嶼的客家華僑約佔 10% 左右，但是大清帝國卻以當地的客家華僑來擔任最早期的五任副領事之角色，頗具政治考量。大清帝國最早期在檳榔嶼設副領事，前五位皆由當地客家華僑（原籍爲廣東嘉應州）擔任，決議發動「三二九廣州之役」時，當時的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和檳榔嶼副領事，皆爲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的客家人。南洋客家華僑在檳榔嶼參加「庇能會議」，並熱心參與「三二九廣州之役」，無論是在革命軍事費用之籌集，或是在革命起義之軍事行動上，皆扮演極重要之角色。例如：謝逸橋、謝良牧昆仲不但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且在「三二九廣州之役」中扮演重要而關鍵性的角色。從南洋回中國執行暗殺的客家革命志士溫生才、陳敬岳等人，也都是南洋客家華僑。

簡言之，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爲：孫中山在同盟會後期，會選擇檳榔嶼作爲中國革命之指揮中心，進而在 1910 年召開「庇能會議」，決議發動「三二九廣州之役」，對其後的中國革命運動之最後成功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主要因素之一，有所謂「客家因素」（包括客家因緣、客家幫）的存在，此點頗值得吾人重視與注意。而「客家因素」可視爲檳榔嶼之所以成爲「中國革命策源地」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其他重要關鍵因素尚有「福建因素」（包括福建幫）、「廣府因素」（包括廣府幫）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

宋哲美（1966）。《馬來西亞華人史》。香港：東南亞研究所。

吳清基（2002）。〈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吳清基在檳城的演講〉，《南洋商報》，11 月 12 日。

吳智棠（1997）。〈論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黃花岡起義和華僑對是役的重大貢獻〉，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5-202。臺北：國史館。

呂亞力（1978）。《政治學》。臺北：五南。

呂亞力（1979）。《政治學方法論》。臺北：三民。

呂亞力（2008）。《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臺北：臺灣東華。

谷光宇（1985）。《政黨論》。臺北：黎明文化。

邱榮舉、謝欣如（2009）。〈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論其民主憲政思想與兩岸民主發展之關係〉，《臺灣憲法與政治研究》，頁 1-44。臺北：翰蘆。

胡　佛（1975）。〈民初政黨政治與國民黨——政治現代化的一項討論〉。國科會獎助報告（未出版）。

孫中山（1923）。〈中國革命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二冊，頁 181-19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張少寬（2004）。《孫中山與庇能會議》。馬來西亞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玉法（1985）。《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玉法（1993）。《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

張希哲（1997）。〈關於「廣州三二九起義」及「黃花崗烈士」的幾點考訂〉，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03-210。臺北：國史館。

張曉威（2005）。《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陳允中（1997）。《新興工業國投資與區域發展：臺商在馬來西亞投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福成（1988）。《中國近代政治結社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介鱗（1989）。《政黨政治的秩序與倫理》。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麥留芳（1985）。《星馬華人私會黨的研究》。臺北：正中。

程全生（1984）。《政黨與政黨政治》。臺北：華欣文化。

黃玉釗主編（1989）。《梅州人物傳》。廣東省梅州市：廣東省梅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黃建淳（1988）。《新加坡華僑會黨對辛亥革命影響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黃賢強（2002）。〈客籍領事與檳城華人社會〉，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頁 213-227。香港：三聯書店。

黃賢強（2003）。〈客家領袖戴欣然與檳榔嶼華人的方言群社會〉，「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馨築文化基金會主辦。10 月 25-2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彭懷恩（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菁英——行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1950-1985）》。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鄒　魯（1953）。《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臺北：帕米爾。

蔣有川（1974）。《新加坡華僑與中國革命運動》。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世昌（1986）。〈中山先生與南洋〉，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頁 47-6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劉阿榮（2010），〈南洋華僑在孫中山革命中的角色〉，「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馬來西亞：檳城。3 月 25-29 日。

賴紹祥、房學嘉（1992）。《客籍志士與辛亥革命》。廣東：人民出版社。

謝欣如（2009）。《客家政治菁英與臺灣憲政發展（1945-2008）》。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愼之（譯），薛君度（原著）（1980）。《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

二、英文文獻

Burke, Edmund (1861).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Present Discontents.” In *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Vol. 1. London: Bahn.

Duverger, Maurice (1963).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Ranney, Austin *and* Kendall, Willmoore (1956).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New York: Horcou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f Sun Yat-sen and the Hakka Chinese in Nanyang Penang

Mei-Hsuan Huang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un Yat-sen i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anyang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and critical role when Sun Yat-sen launche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They provided money, manpower and ideas as well. They supported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ensured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has two purposes. The first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ang and the “329 Battle of Guangzhou” and the importance of Penang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Sun Yat-sen. Secondl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Chinese in Nanyang Penang and the “329 Battle of Guangzhou” launched by Sun Yat-se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as there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nyang Chinese, who established “Penang” as their stronghold, and the “329 Battle of Guangzhou” launched by Sun Yat-sen in 1911? What was the role played by Nanyang Chines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Sun Yat-sen?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Hakka Chinese in Nanyang Pen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particular, how did the ethnic-Hakka brothers Yi-Chiao Hsieh and Liang-Mu Hsieh play a critical role for Sun Yat-sen and the Nanyang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pproach i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finds a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the Hakka Chinese in Nanyang Penang.

Sun Yat-sen set up a revolutionary command center in Penang and held the "Penang Conference" there. For this reason, Sun Yat-sen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nyang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especially the ethnic-Hakka brothers Yi-Chiao Hsieh and Liang-mu Hsieh. The "Hakka factor"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key reasons why Penang became the "hotbe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Chinese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 Hakka,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329 Battle of Guangzho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